

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浙江女子教育

谷雪梅

(宁波大学 文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近代浙江女子教育是以基督教传教士所办女子学校为发端。教会女校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带有“文化侵略”的性质,但在客观上传教士创办女学的实践,直接改变了清末浙江妇女的教育现状,并对近代浙江女子教育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传教士; 浙江; 女子教育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27(2008)05-0032-04

近代来浙的基督教传教士中,不少人积极从事教育活动。传教士是近代浙江女子教育的开创者,创办了中国大陆第一所女塾。他们创办的女校不仅打破了教育上的女禁,而且逐渐形成了一套迥异于中国传统教育的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办学模式,成为近代浙江女子教育的发轫。

受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观念的影响,女子学校教育在古代中国被严重忽略。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女塾,是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教会女子教育存在的时间较长。1842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到浙江从事宣教活动。随着传教的深入展开,教会女学应运而生。浙江宁波是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公元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传教士爱尔德赛女士(Miss Aldersey)来宁波传教,在宁波创办女子学校,^{[1][1121]}开设了国文、算术、圣经等课程。这一举动既是西方教会在华创办女学之始,也开创了近代浙江女子学校教育的历史。1846年(道光二十七年)美国长老会差会的传教士在宁波城内设立一所女校,这所学校在1857年(咸丰七年)同爱尔德赛所办女校合并,称崇德女校。1860年(咸丰十年)美国浸礼会女传教士罗尔梯(E.C. Lold)在宁波城北江滨创办浸会女校,后改名圣模女校。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外国传教士取得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办学、置产等特权。随着外国侵略者对中国侵略活动的加深,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中对教育也更加重视。美国长老会、英国圣公会、美国浸礼会等传教团陆续深入浙江腹地,在杭州、绍兴、湖州、温州等地建立女子学校。例如,1867年(同治六年),美国基督会南长老会在杭州皮市巷创办贞才女学,这是杭州最早的女学。此后陆续有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美国基督教会北长老会在杭州大塔儿巷创办的育才女学堂,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美国基督教会北浸礼会传教士创办惠兰女学堂,1910年(宣统二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冯·玛利亚创办的冯氏女子学堂等。1876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士于府城观音桥建书堂,并附设国民女子学校一所,这是绍兴近代女子学校之始。在温州,1875年,英国内地会开办了一所女学校;1878年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在永嘉创办学塾,后改称为艺文学堂,1904年,设艺文女学。1901

收稿日期: 2008-04-08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7年研究课题(07N48); 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课题(07JDHY004YB)。

作者简介: 谷雪梅(1973-),女,黑龙江尚志人,宁波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

年(光绪二十七年),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将办在江苏省嘉定县的文洁女校迁来浙江省湖州继续办学,改称湖郡女子中学。到1917年(民国六年),浙江全省各类教会学校共128所,其中,女子学校15所。^{[2](238)}此外,传教士还设立了专科学校,如1904年(光绪三十年),英国圣公会在杭州广济医院设立广济产科学堂,主要学科为助产。^{[3](148)}

随着教会学校的发展,传教士也逐步改变了低层次的办学模式,初步形成了一整套教育模式。教会女校由低到高逐渐建立起来,办学规模由小到大,办学层次也逐步提高,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以1846年美国长老会创办的宁波崇德女校和1860年美国浸礼会首办的圣模女校为例,两校开办之初是小学,后来发展成中学,将中学部和小学部分开独立办理。1923年,两校中学部合并成甬江女子中学。^{[4](154)}1912年,杭州的贞才女学、育才女学、蕙兰女学三校合并为弘道女学。1927年更名为“杭州市私立弘道女子中学”。

二

总体而言,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的初始目的是传播教义,为“上帝”寻找臣民。教会女子教育事业与其他教会教育一样,是西方教会利用宗教施加文化影响的产物,始终贯穿着为宗教服务的目的。但传教士在浙办学的客观效果与其主观愿望并不完全一致,对近代浙江女子教育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基督教传教士创办教会女学冲击了传统的封建教育体制,促进了民众女学意识的萌发。

在晚清之前,中国妇女一直受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法关系的压迫,女子就学受到极大限制。传教士兴办女学的活动,给女子受教育的机会,打破了千百年来女子无权接受学校教育的禁忌。这等于承认了女子和男子一样,同样有智慧和接受教育的权利。这可以从《万国公报》(原《中国教会新报》)所发表的大量有关女子教育的论述得到验证。林乐知在《重视教育说》一文中指出:“中国女学不讲,以废弃人民之半数”;“中国教育之尤为缺少而不能与西国教育并衡者,则在于不兴女学”;“女子无学,终不能得真实之兴盛,西国教化之成为文明,未使不由于振兴女学之功,此则尤有厚望于当国者也。”^{[5](419)}

1844年,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传教士爱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创办女校。当时一些从事女子教育工作的传教士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具有一定的教育经验。例如,兰显理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43年毕业于伯林斯登大学,1847年毕业于神学院。1849年23岁的兰显理偕夫人来华,居宁波,负责管理女学堂,“教以圣书、算学各书。”^{[6](76)}除了教育工作外,兰显理还参加美华书馆出版书籍的校勘工作,并尝试将圣经翻译成宁波方言;倪维思(1829~1893),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1854年携妻到达宁波,从事教育工作,1861年赴山东,她们在宁波7年,所办男女寄宿学校,颇有起色。

丁匙良回忆他在宁波传教办学的经历时谈到:“……这些妇女被传统观念所左右,认为自己作为女人的境遇是如此的不幸和低人一等。然而从伦理道德上来说,妇女是中国更好的那一半人口—她们谦卑、优雅和俊秀。在智力上,她们并不愚笨,只是无知。由于不能上学,她们只能在若明若暗的朦胧状态长大成人。她们的潜质可以从以下事实来进行推测,即在诗人、历史学家和统治者的名人堂里仍可以找到不少妇女。我在中国所遇见的几个最聪明的人就是我们教会学校中的女生。”^{[7](51)}

传教士创办女子教育的实践及对女子教育问题的宣传,在思想上给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以启迪,使其认识到女子教育不但必要而且可能,这为近代浙江女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904年,高白淑夫人创办了杭州女学堂,这是浙江第一所自办女学堂。清政府在1907年拟定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及《女子小学堂章程》。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浙江女子学堂有32处,教职员202人,学生995人。^{[8](650)}

其次,传教士从事女子教育的实践在教学内容和方法、教育管理等方面对浙江近代女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一套可资借鉴的方法和经验。

在传教士办女学之前,浙江没有专门的女子学校教育,所谓的女子教育主要采取以家庭为单位

的独立分散的个别教育为主要形式；其内容主要是《女戒》《内则》《女孝经》，等等。主要是将女子束缚于家庭，充当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料理家务的角色，发挥凝聚家庭、稳定社会的作用。

传教士所办女学一改浙江传统教育中的弊端，实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全面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基督教传教士在教会女学中，除强调宗教课程外，还开设了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科目，包括国文、算术、天文、历史、地理、音乐、英文、物理、化学等课程。有些女校甚至开出代数、几何、动物学、植物学、钢琴课等课程。1949年宁波长老会学校报告的课程大要记载：“凡女生均教以本国之文字。彼等不习中国经书，惟诵读含有基督教教训之课本及浅近科学书籍而已，复以口头上之问答，俾彼等熟习圣经中之故事。数学与地理亦为彼等课程中之一部分，而尚有两学生，则并习英语焉。彼等习于勤劳之习惯，并授于种种之工作，使於其将来所处之地位，能为有用之服务焉。”^{[51](240)}

传教士在教会女校中设置这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课程，在传统的中国女子教育中是从未有过的。例如，蕙兰中学堂开设六门课程：国文、英文、算学、理科（生物学、地文学、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历史、道学（圣经）。另设三门附科：音乐、图画、体育。各科学分比例为：国文二分，算学一分，理科一分，英文一分。每周授课20至26小时。学习程度相当于当时美国中学。学生须将规定的各学科课程全部学完，考试及格，方能毕业。

教会学校不仅传授西方的科学文化，而且还介绍了新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管理。女校主要采取班级授课制，按照学生的文化程度划分年限，在此基础上设置小学、中学及其他职业学校。宣统三年（1911），蕙兰中学重订的学堂章程，规定学堂分预科和正科。预科二年，相当于高等小学堂程度。正科四年，是中学堂程度。^{[3](110)}甬江女子中学，初中三学级，高中三学级。

在教学过程中，教会女学还较为注重实验教学和直观教学，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这对传统教育模式造成极大冲击。以吴兴私立湖郡女子中学为例，小学低年级采取设计教学，中高年级采取自学加辅导；中学注重自习与实验。此外，有的教会女学还建立奖学金制度。以杭州冯氏女子学校为例，“1909~1910年，8名通过了圣书考试的女孩竞争奖学金，她们之中三名来自绍兴，四名来自杭州，一名来自宁波，最终有四人获得了资助。”“获得资助的女孩，每学期有25元的奖学金，直到离校。”^[9]

再次，传教士所办教会女学有助于社会风气的转移，从而为近代浙江女子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

教会女学创办之初，大多程度较低，大多为小学阶段，招生工作也十分困难。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办学，而新学之风未开，入“夷馆”求学在当时也要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学生来源也受到很多的限制。1844年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塾以后，谣言四起，有人说她是魔鬼的化身，已杀死她自己的孩子，现在又来算计别人的孩子；有人说她办学是假，骗儿童去挖眼睛炼药水是真。为了吸引学生入学，爱尔德赛女士采取了免收学费、发给衣物等措施，收效较为明显。“时风气未开，甬人颇疑虑，裹足莫前，女士不以此灰心，卒的学生数人，豁免其学费，供给其饮食，且津贴其家属，以是渐得社会信任，翌年，乃有学生十五人，后增至数十人。”^{[1](1122)}

随着教会女学的发展，其示范效应逐渐显现。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在新的职业领域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因彼等于受教育之后，不但能增加家庭收入，并能于择婿之时，有较好机会焉。”^{[51](240)}这也是富家和官绅子女越来越多就读教会学校或留学海外的内在原因。这样，尽管早期教会女学的补助及津贴也逐渐被取消，但招生状况却有了明显改观。以杭州冯氏女子学堂为例，“1910至1911年，冯氏女中的学生有22人，其中13人来自于非基督教家庭，且几乎都来自于宦宦家庭。”^[9]这表明浙江官绅对新式女学由以前的抗拒转变为赞同。官绅教育观念的转变成为浙江自身新式女学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社会环境。

最后，基督教传教士在教会女学中培养了一批接受新知识的新女性，推动了浙江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

传教士大都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宣传基督教信仰的同时，还带入了新的生活方式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独立等观念，许多在读的中国女学生渴望了解世界，掌握新知识，改变中国愚昧落后的面貌。教会学校确是培养出众多才俊精英，推动了浙江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甬江女子中学第一任国人校长沈貽芾（1900~1989）1915年就读于宁波教会学校圣模女校，1926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后进入甬江女子中学任教。1927年宁波当局政府和教育界人士以“宁波收回教育权急进会”的名义，驱逐美籍校长，将甬江女中教育权收回，时任教务主任的沈貽芾任校长。此后，甬江女中跻身浙江省立中等学校行列。学校管理完善，声誉良好。至1935年，已有学生200余人，教职员20余人。

早期留学生中，女性所占比例很少。但也有女留学生勇于冲破束缚，付出艰辛，学成归来，在事业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例如，宁波早期教会女校毕业生金雅妹，1869年留学日本和美国，成为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1881年金雅妹赴美国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专攻西医学，她是该校惟一一位中国学生。188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继续实习，3年后回国毕生从事医学教育事业。

湖南教育家曾宝荪，其曾祖父是晚清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1909年曾宝荪入杭州英国圣公会办的冯氏高等女校。1912年，英籍女校长乘回国休假的机会将她带到英国。后来，曾宝荪回忆道：“留学英国的机会，是我生命一大转折点。”1913年9月，曾宝荪正式成为伦敦大学西田学院的学生，主修生物学。她不断朝夕问道，求知若渴，而且深受西田学院在教育方法上尊重学生人格，师生相互信任的启迪。1916年夏，曾宝荪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伦敦大学理学学士学位，后曾宝荪又在伦敦就读师范学院，蓄志以教育为终身职志。1917年曾宝荪取道美洲回国，全心投入教育。

基督教传教士对传统教育的审视，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认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传教士创办女校的实践，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为浙江女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准备。客观上冲击了浙江旧的教育制度，促进了浙江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 张传保, 赵家荪. 政教志 [M] // 张传保, 赵家荪. 鄞县通志.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6.
- [2] 浙江教育简志编纂组. 浙江教育简志[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 [3] 王蛟. 杭州教育志(1028~1949) [M]. 杭州: 杭州教育出版社, 1994.
- [4] 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宁波文史资料(第三辑)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 [5] 李楚才.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 [6] 鲍明鉴. 基督教长老会浙江省宁绍中会70年史略[M].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7.
- [7] 丁匙良. 花甲忆记[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8] 朱有猷.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 [9] The Church Mission Society.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G1 CH 2 O Original papers Reel297 [M]. Wiltshire: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9.

Missionaries and Contemporary Women's Education in Zhejiang

GU Xue-mei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Women's education in Zhejiang, initiated by church schools, is characteristic of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of China. Therefore, it is a kind of "cultural invasion" by nature. But, in actuality, the girls' schools established by missionaries have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women's education in Zhejiang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missionary; Zhejiang; women's education

(责任编辑 裴云)